

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

黄雁鸿 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

黄雁鸿 著

商務印書館

2012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 / 黄雁鸿著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2

ISBN 978 - 7 - 100 - 08561 - 8

I. ①同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慈善事业—历史—澳门—
IV. ①D63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1982号

本书蒙澳门基金会资助出版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

黄雁鸿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08561 - 8

2012年4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/2

定价: 28.00元

目录 Contents

序一（柏寒） / 001

序二（徐凯） / 004

绪论 / 010

第一章 清末民初葡人治澳与澳门华人社会 / 043

第一节 移民特质的澳门社会 / 047

第二节 葡人管理澳门的华人政策 / 064

第三节 华人社群领袖的出现与作用 / 083

第四节 澳门华人慈善组织的出现及运作特色 / 100

小结 / 107

第二章 “同善”理念与新式救济组织：创会初期的同善堂（1892—1920） / 109

第一节 创会时期的澳门社会 / 112

第二节 同善堂的创会理念：“同善”之名的意义 / 137

第三节 创会初期的同善堂 / 154

小结 / 188

第三章 同善堂的运作及与政府的关系：发展时期（1920—1949） / 189

第一节 合法性与政府干预 / 191

第二节 法定地位下的组织与经营 / 216

第三节 发展完善的社会赈济 / 246

小结 / 270

第四章 同善堂绅商中的杰出人物及其慈善活动 / 272

第一节 卢九、卢廉若父子 / 274

第二节 何连旺及其他创建者 / 287

第三节 高可宁对同善堂的参与 / 299

第四节 崔诺枝及其他贡献者 / 308

小结 / 321

结论 / 323

参考文献 / 326

后记 / 347

序一

柏寒

在北京中华世纪坛，有一条流淌着中华五千年历史的长河——铜甬道，上面记载着五千年来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，闪耀着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光辉。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，有这样一条记载：

1892 年，澳门慈善机构同善堂创立。澳门同善堂，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，永远镌刻在世纪坛上，充分说明了它在中国历史上、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。看到这条闪闪发光的记载，面对历史长河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同善堂的主席、值理们以八九十岁的高龄，拄着手杖沿门劝捐的动人情景。一年一度，每年竟募得几百万元善款，然后涓滴归公，全部用于助老济贫。119 个春秋，它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家庭赠衣送药、赈灾施教、派米殓葬……真可谓惠泽社群，功德无量。

同善堂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此，它的创建和活动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世界意义。当今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带来了一系列的“全球化弊病”：环境污染、资源滥用、贫富悬殊、失业增加……为了消除这些弊病，非常有必要发展类似同善堂这样非营利性质的、自愿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援助的公益机构。它们关怀社会的弱势群体，规范人们的行为和道德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改

善社会环境的治理。它是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实验机制。

多年来，特别是回归以来，澳门学术界对澳门的历史文化开展了深入的研究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。城市之小，著作之丰，举世罕见。然而，对同善堂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。5年前，黄雁鸿就读于北大历史系，当她提出以同善堂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，我很支持，但也很担心，因为资料缺乏。一百多年来，同善堂做的善事车载斗量，但文字资料保存和积累下来的却寥寥无几，黄雁鸿以执著的学术追求精神，毅然确定了选题。在北大历史系著名明清史专家徐凯教授的悉心指导下，历经四个寒暑，黄雁鸿终于完成了这项研究。当她把厚厚的博士论文放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感到它沉甸甸的，捧读了两遍，看来字字皆心血，4年辛苦不寻常。

《同善堂与澳门华人社会》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：

第一，作者把同善堂放在清末民初大的社会背景下，考察那个时代澳门的华人社会，运用后殖民主义的离散族群理论（Diaspora），分析澳门华人社团的缘起——它起源于华人对祖国强烈的归属感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；华人社团通过组织各种活动、开展赈灾，进一步增强澳门华人的凝聚力、民族向心力。面对繁复的史料，作者以离散族群理论为指导进行梳理，豁然贯通，从而对纷杂的澳门社会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。同时，又以马克思·韦伯（Max Weber）的组织理论，阐释了华人绅商在澳门社会政治、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从而担当了领袖的角色。本书重点分析了卢九卢廉若父子、何连旺、高可宁、崔诺枝、李际唐、蔡文轩、何贤、崔六等一系列同善堂创始人及华人社群的领袖人物，以他们卓越的活动、杰出的贡献为线索，对同善堂的历史进行重塑，指出它在澳门特殊的

历史语境下，融合了中国民间慈善行为及西方的福利精神，一百多年来，对澳门社会的稳定以及走向现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第二，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资料，解决同善堂材料不足的问题，作者上下求索，苦苦追寻，查遍了同善堂所藏捐册、碑记、匾额楹联及功名录；政府宪报资料、方志家谱、传记日记、报纸杂志；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纪念刊物……可谓筚路蓝缕，披荆斩棘。繁杂的史料经作者举要删芜，去粗取精，终于集腋成裘、聚沙成塔。这使得本书资料翔实可靠，论据炳炳凿凿。

居澳一十四载，深感澳门是一座文化金山。“黄金”含量十分丰富：郑观应和郑家大屋，孙中山和中山纪念馆，卢九花园，东西望洋，醉龙醒狮，龙环葡韵，大三巴，妈阁庙……众多的历史遗迹，重要的文化遗产，亟待我们去研究，去探索，去整理，去挖掘。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，弘扬异质文化交流融合的精神，是民族的需要，也是世界的需要。黄雁鸿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在这方面有所建树。故乐为之序。

序二

徐凯

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，我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，学人坚持史学的本位思想，借鉴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，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社会史研究，著述成果丰硕。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，涉猎范围广泛，上自国家与社会结构，下至区域和民间生活，包括礼法等级、身份职业、生态环境、宗族家庭、婚丧祭祀、衣食住行、岁时俗令、娱乐文化、宗教信仰、灾害救济等。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特点是：一、在多元学科的视野下，将实证考据与理论思辨相结合，重新审视社会发展史；二、不断地拓宽研究范围，一些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突破；三、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，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，从不同视角比较全面地解析问题；四、深入发掘文献数据，充分利用各类方志、档案、族谱、家乘、年谱、碑刻、契约文书等，以及田野调查、口述等历史记忆和实物数据。相比之下，澳门社会史研究显得十分薄弱，诸多方面的问题亟待开展研讨。

2004年秋季，受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教授之邀，客座教席，小住澳门半年，使我有机会考察澳门。徜徉在澳门，脚踏着用葡萄

牙石子铺成的静谧甬道，仰观传统与现代不同风格的街巷建筑，东望洋山的灯塔、西望洋山小圣母堂、大三巴牌坊、圣若瑟修院、葡澳当局的市政厅等具有欧洲哥特式、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，以及观音堂、妈阁庙、菩提禅院、郑家大屋等具有岭南风格的中国古建筑，交辉掩映，目不暇接，仿佛在穿越 16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空隧道。

澳门这块莲花宝地根植于祖国内地，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。以晚清民国时期为例，内地与澳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皆紧密相连。譬如，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广东天地会起义。咸丰六年，英国借口“亚罗号”事件，侵犯广州，激起我军民的强烈抵抗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澳门居民沈志亮等刺杀葡督哑吗嘞（Joa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），遂被杀害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戊戌变法失败，维新志士避难澳门。之后的辛亥革命、护国运动、军阀混战、广州起义、抗日战争等，澳门市民同祖国人民共命运，支持正义，反对邪恶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现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迁客骚人题咏澳门之诗歌，^[1]多叙述以上的事件，可资为证。

晚清人钟兆霖《澳门渡海感赋》诗云：“顾谁早具终军志，吊古终怜陆贾才。如此繁华好风土，却教夷虏起楼台”，抒发了作者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悲愤心情。澳门早期是个以外贸为主的社会，生活着多数从广东、福建等移民而来的华人，及葡国人、土生葡人等。鸦片战争之后，英国占据香港，垄断了对华贸易。从此澳门对外贸易衰落，鸦片烟馆、赌馆、妓馆、歌楼等林立，华工苦力贸易等业

[1] 参阅章文钦：《澳门诗词笺注·导言》晚清卷、民国卷，珠海出版社 2003 年版。以下所引诗歌均见此书。

也随之兴起。当时赌博的形式有番摊、白鸽票（彩票）及“卜榜花”（猜科举考试士子中试之姓，又称“闹姓”）等。丘逢甲《澳门杂诗》曰：“门牌高署市门东，百万居然一掷中。谁向风尘劳物色，博徒从古有英雄。”梁乔汉《镜湖杂咏·风土杂咏》云：“赌饷承充累千万，番摊闹姓戮渊连。草堆街畔人如蚁，烟火家家不夜天。”博彩业是澳门当局财税大宗来源，自然成为澳门支柱性行业。

澳门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殊地方，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、社团数量达两千余。他们均有各自的团体章程、行为方式与活动区域，彼此和睦相处，为澳门的发展出力。澳门宗教呈现多元化，都说妈祖、玛利亚、观世音、王母娘娘“四大女性”在呵护澳门。澳门比较多的居民信奉佛教、天主教，还有道教、基督教、巴哈伊教、摩门教、神慈秀明会等十多种宗教，各教派也有各自的信徒与道场。这里又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，每逢中外重大节日，行政长官同天主教主教、观音堂主持等，共同担任主礼嘉宾；春节和圣诞、清明节和追思节，不同族群的市民都要举行活动。澳门是开放的社会，人们的生活多姿多彩，又保存着诸多的历史遗迹，积累了丰厚的中外文字的数据。研究澳门社会史当大有作为。

澳门回归祖国十余年来，在“澳人治澳”的方针指引下，以博彩、旅游为“龙头”产业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，社会稳定祥和。澳门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课题。以往澳门研究涉及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法律、宗教、思想、教育、中外关系、人物、文化、艺术等方面，出版了大量的专著、论文、中外档案等。从学术视角看，以往澳门研究偏重历史，其他领域鲜有问津；宏观著述多，专题探研少。一些澳门研究的著述，因受条件限制，不能充分利用

葡语等档案文献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。随着葡萄牙、西班牙殖民者的东来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，中国历史的书写已纳入国际化范畴。澳门史编写更是首当其冲，只有以全球化的视角，广泛汇集中外数据，作诸多专题性的探索，再加上多年不懈的努力，方能编纂出一部可信的澳门史。

客座理工学院讲席期间，我主讲《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讲座》课，中西文化研究所黄雁鸿编辑担任教学助理。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有关澳门历史问题，她立志赴北京大学深造。2006年秋季，她考入北大历史学系，师从于我，攻读清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。此前雁鸿已取得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，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。在北大学习期间，她勤奋读书，刻苦钻研，钟情于澳门社会史，并以清末民初的澳门慈善组织同善堂为个案研究，苦心孤诣，孜孜不倦，完成了博士论文，获得博士学位。返澳后，雁鸿对此项研究锲而不舍，充实资料，修订舛误。如今她的博士论文将付诸梨枣，这是澳门社会史专题研究的应时之作，必将对澳门近现代史探究起到促进作用。

通览雁鸿博士的大作，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具有开拓性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填补了澳门社会史研究的空缺。

澳门开埠四百余年，在社会公共道德、公益事业方面，具有优良的传统。例如，华人慈善机构同善堂、仁慈堂等，始终坚持救济困难的民众；许多义工放弃休息，照顾孤寡老人；众多社工辛勤地服务于学校、小区；数以万计的市民参加每年一度的百万行活动，筹集善款等。作者从慈善事业切入，以百年华人慈善机构同善堂为

个案研究对象，将其置入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与中西文化交汇的宏大背景下，加以系统考察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同善堂创会的理念，社会赈济机制，及与澳葡当局关系等，揭示了风雨百年的同善堂在殖民地澳门救济灾民，维护社会稳定；凝聚华人，认同中华文化；发展慈善事业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。该课题研究学术价值比较高，填补了澳门史研究的一项空白。

第二，再现了同善堂的历史风貌，所论创新之处亦多。

该著作追根溯源，还原了澳门华人社会慈善组织同善堂的创建理念、组织结构、实践活动的历史风貌；这些举措增进了华人对祖国的眷恋和对澳门的热爱，在稳定澳门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；一批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杰出绅商，例如，卢九、卢廉若、何连旺、高可宁、崔诺枝等魅力型领袖成为同善堂组织有力的支柱，他们是华人社团与澳葡当局沟通的桥梁，争取和保护着华人的利益；该著作重塑了19世纪末的澳门华人小区，在离散族群的历史背景下，华人社群领袖在澳门社会的独特作用。所言之处，多发前人之未论，新意迭出，给人启迪。

第三，广集第一手史料，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之法。

在浩瀚的典籍中，作者披沙拣金，乐此不疲，征集中外文字的第一手史料，辑录了大量珍贵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档案、葡文档案，其中包括宫中朱批奏折、外交文书、葡萄牙东波塔档、民政厅档、澳门宪报、澳门殖民地公报等；同善堂章程、同善堂捐册、行会档册、地方史志等；族谱、家谱、碑记、墓志、文集、笔记、社会调查报告等。丰富翔实的资料为本书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作者参阅中外相关学术成果，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。作者利

用马克斯·韦伯（Max Weber）社会组织理论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等新的社会科学理论，剖析澳门特殊环境下华人慈善组织同善堂对华人的救济活动，阐述了在中西文化背景之下的中葡关系，方法得当，论述比较深刻。

由于诸种原因，现存的同善堂自身档案不完整，致使书中对同善堂历史活动的描述略显单薄，诸如在医药、教育、生活等方面的资助与社会反应等，有待时日寻觅其遗失资料，加以补充。另外，当时澳门中葡慈善救济活动的全貌，中国政府与澳葡当局关系的变化对华人社会的影响，与同善堂之关系等，阐述得不够充分，留待日后可作专论。

雁鸿博士负笈燕园四载，敏而好学，兼收并蓄，初学有成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曰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望能将此语置之座右，上下求索，自树旗帜，学术上定能取得业绩。

初夏之时，雁鸿来电索序于我，借此机会谈一点澳门史研究的浅识，及对她大作的感言，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赐正。是为序。

辛卯年夏季

写于蓝旗营小区寓所澹泊书屋

绪论

一、本书研究的意义及研究主旨

若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地理分类，澳门刚好是处于中国大陆这种“平原流域”和葡萄牙这种“海岸区域”的不同地区的交汇处，既有平原耕地上人民闭关自守的特性，也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。^[1]因此，若要审视这位哲学家所倡导的“哲学的历史”，澳门的特殊地位也能更高层次地在阐述原始历史的轨迹之余，进行历史的思想考察^[2]——而考察成果，则是澳门文化表现上的兼容并蓄，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：

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。最后一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，是西方文化的传入。这一次传入的起点，从时间上来说，是明末清初；从地域上来说，就是澳门。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时间，这种传入时断时续，时强时弱，但一直没有断过（中国文化当然也传入西方，这不是我在这里要

[1] 〔德〕黑格尔著、王造时译：《历史哲学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94页。

[2] 同上，第8页。

谈的问题)；五四运动，不管声势多么大，只是这次文化交流的余绪。可惜的是澳门居中西文化交流中这十分重要的地位，注意之者甚少。我说这话，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。明末最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，而据点则在澳门。^[1]

近年来，澳门受到的社会关注度不断增加，1999年回归盛事，带动了内地的“澳门热”；一系列澳门史籍的出现，使学界的焦点聚集到这个盛载了中华文明与西欧文化近五个世纪，原本不足四平方公里、“规圆如镜”而“孤悬海表”的“香邑一隅”^[2]，也从而发掘了弥足珍贵的中外文献，来重塑这段历史。然而，大部分的澳门史，都以中葡关系或澳门的中西文化为述史基轴，触及的层面，从澳门的政权、政治发展到社会、经济及文化，却未见一部专门研究澳门华人社会史或澳门华人救济史的著作出现。尤其是晚清时期的亚马留总督在控制了澳门的领土、行政及税收，又关闭在澳门的粤关关部行台，使澳门进入葡萄牙管制时期之后，这里的华人在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和生活上的待遇基本上是处于孤立状态：得不到殖民者的支持，也失去了过往一直可以依靠的清政府，他们在需要救济时又可得到哪些救助，救助的团体或机构是如何组成，这些团体或机构反映了澳门文化和社会的何种特色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到目前还是阙如的。

清末民初是澳门历史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。政治上，鴉

[1] 陈炎：《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》（季羨林序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。

[2] 根据最早的澳门地方志即清代印光任和张汝霖编撰的《澳门纪略》，澳门的面积大概是“东西五六里，南北半之”，地形则是“有南北二湾，可以泊船，或曰南环。二湾规圆如镜，故曰濠镜”。（清）印光任、张汝霖著，赵春晨校注：《澳门纪略校注》上卷《形势篇》，澳门文化司署，1992年。

片战争结束，葡萄牙人眼见中国的落败，觊觎澳门已久的野心再次兴起，于是有葡国女王玛利亚二世颁下赦令（1845），宣布澳门成为自由港：“不论是内河港还是函仔的海港，一律向其他国家开放贸易，函仔港可停泊 500 吨以上船只，小吨位船则可进泊澳门”^[1]，并且任命亚马留（João Ferreira Amaral）为总督。亚马留由上任至遇刺三年多的时间，就彻底改变了澳门由 1553 年开始的“中葡分治或混合式的管辖”^[2]，并由议事会实行澳城区内部自治，对外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，而澳城区以外的华界则由明清政府管辖的“双核心”、“双重效忠”^[3]的政治模式，走向由澳葡政府控制税收，编纳门户，捣毁清廷关部行台，把管制范围扩充至华界甚至离岛的殖民式管制。经济上则是香港开埠导致澳门的急遽衰落。正如澳门议事会的法官于 1841 年 1 月 21 日致葡国海事及海外部部长的公函所称：

在距离澳门城咫尺之处，同意香港开埠，对澳门来讲，无异于致命一击。国人、外人、华人一致认为，对葡萄牙人而言，门的贸易，公共收入，海关等等的结束，指日可待。^[4]

[1] 〔葡〕施白蒂著、姚京明译：《澳门编年史》（19 世纪），澳门基金会，1998 年，第 90 页。

[2] Lourenço Maria da Conceição, 1998, 1862-1887: *Macau entre Dois Tratados com a China*,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, p. 51.

[3] 吴志良、金国平：《再论“蕃坊”与“双重效忠”》，《镜海飘渺》，澳门成人教育会，2001 年。

[4] Saldanha Antonio Vasconcelos, Machado Joana Pinto, Figueiredo Ana Paula, Jin Guoping & Zhang Zhengchun（萨安东等），1996, *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(1839-1842)*, Macau: Fundacao Macau & Centro de Estudos das Relacoes Luso-Chinesas: Universidade de Macau, pp. 162-163. Doc. N°. 33.